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编

齐鲁书社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编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2
ISBN 7-5333-1605-3

I. 汉... II. 汉... III. ①秦汉考古—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文化史—中国—汉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71.41-53②K234.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0072 号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qlss.com.cn>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7 印张 4 插页 971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605-3
K·496 定价: 98.00 元

章丘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主 任 刘庆柱 谢治秀

副主任 邹卫平 白云翔 陈先运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白云翔 刘庆柱 安家瑶 李传荣

毕筱奇 邹卫平 佟佩华 陈先运

郑同修 姜 波 崔大庸 谢治秀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留念

中国·济南·章丘
2004.8.20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人员合影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

目 录

上 编

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毕筱奇(3)
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徐长玉(4)
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邢玉斗(5)
关于当前汉代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刘庆柱(6)
努力开创汉代考古与汉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	白云翔(13)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辞	谢治秀(18)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考古杂志社记者(20)

下 编

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考古收获和研究	李毓芳(27)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秦汉边城初探	徐龙国(33)
西汉长安城的沿革与形制布局的变化	刘振东(49)
汉长安城宫殿附属地下建筑研究	张建锋(60)
汉长安城所见西汉宫殿建筑室内装修手法浅析	王晓梅(76)
汉魏洛阳故城 40 年的考古勘察收获	钱国祥(80)
东汉洛阳的郭	肖淮雁(96)
东平陵城与济南国	郑同修 胡常春 马前伟(103)
试论神木大保当发现的汉代城址	王炜林(113)
试论汉唐时期中国宫城池苑之特点	汪 勃(120)
洛庄汉墓 14 号陪葬坑编磬刻铭初探	崔大庸 邹卫平(146)
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三题	刘 瑞(157)
西汉诸侯王陵墓形制的演变	刘 涛(172)
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的	孙 波(194)
山东地区汉代诸侯王墓略论	张启龙(215)
试论济宁地区的两汉诸侯王墓	
——兼谈汉代诸侯王葬制	田立振 解华英(221)
洛庄汉墓墓主考辨	宁荫棠(234)

危山兵马俑时代与归属猜想	张从军(236)
徐州市铜山县楚王山汉墓群考古调查	刘照建 梁 勇(247)
从梁孝王寝园看西汉早期建筑特点	张志清(255)
洛阳地区汉代墓葬形制的考古学观察	石自社(260)
汉代的预作寿藏	杨爱国(271)
汉代墓葬分布与县城的位置关系	
——以山东地区为中心	[韩国]金秉骏(282)
河南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年代诸问题再探讨	陈彦堂(305)
胶东地区汉墓的特征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党 浩(314)
汉代墓室壁画和汉代绘画史研究	杨 泓(321)
马王堆出土非衣的考察	[日本]菅谷文则(325)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上的文字内容探析	洪 石(329)
汉代铜灯初步研究	申云艳(340)
西汉镜铭中的史影	马良民(355)
试论山东出土的汉代铜镜	李曰训(361)
洛庄汉墓9号坑所出部分马具及其相关问题	郭 物(383)
东汉中期两京地区墓葬出土朱书陶器的相关研究	郭晓涛(402)
济南无影山汉墓“鸬形陶鸟”考析	何洪源(408)
济南市博物馆藏汉代齐国封泥考略	李晓峰 杨冬梅(414)
师冯五铢范的时代和性质考	张童心 黄永久(425)
河东郡汉代烘范窑的发现与研究	张童心 张庆捷(427)
试论渝东地区战国至西汉中期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及相关问题	杨 勇(431)
汉代东南沿海与辽东半岛和西北朝鲜海路交流的几个考古学例证	郑君雷(449)
岭南汉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地域性	朱海仁(455)
汉代闽越考古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梅华全(462)
秦汉时期泰山观的变化	
——关于秦始皇刻石和《淮南子》中泰山记事的比较分析	[韩国]李成九(471)
汉代“胡人”图像补说	刘文锁(487)
关于日本列岛弥生文化中大陆文化影响的多重性	[日本]深泽芳树(494)
关于汉代中国内地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几个问题	李慧竹 王 青(511)
汉代农业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刘兴林(520)
由考古发现看汉代山东地区的农业	房道国 刘会先(538)
北魏玻璃	安家瑶 刘俊喜(550)
广元石窟窟龕形制初步研究	姚崇新(558)
唐长安城市场探析	何岁利(572)
由铭文砖瓦谈唐长安城宫城的砖瓦之作	龚国强(581)
编后记	(590)

上 编

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山东省章丘市市长 毕筱奇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今天，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市隆重开幕了。首先，我代表中共章丘市委、市人民政府对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章丘市地处山东省中部，西接省会济南，南依泰山，北临黄河，总面积 1855 平方公里，总人口 98.9 万人。章丘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龙山文化”的发祥地。境内自然景观优美，历史遗迹众多，有百脉泉、锦屏山、朱家峪民俗村等景区和城子崖遗址、齐长城、东平陵故城等古迹。历代名人辈出，是战国时期哲学家邹衍、唐代名相房玄龄、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近代著名商业资本家东方商人孟洛川的故乡，有“铁匠之乡”、“小泉城”之美誉。章丘资源丰富，区位优势，交通便利，具有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目前，我市已形成“一区三组团”的发展格局，投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2003 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144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7.06 亿元，再次跻身全国经济百强县（市），列第 78 位。

市委、市政府在高度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还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在加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章丘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加大了对章丘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山东省境内至今有 12 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章丘就有 4 处入选，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章丘在汉代文化和汉代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平陵故城早在汉代就是著名的手工业城市，济南郡治所在地，又为济南国王都，尤其是近年发现的洛庄汉墓、危山兵马俑更是惊动了全国考古界，为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详实资料和实物。

当前，我市提出了“建设济南大城市框架下富而美的新章丘”的宏伟战略。这次在我市召开的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必将对实现我们的目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为我市更好地进行历史文物保护和开发，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最佳思路，找到了最新突破口，也将极大提高章丘的知名度，为我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为全市增加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品位创造新的条件。

最后，祝本次国际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和来宾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 徐长玉

尊敬的刘所长、朱主席,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上午好。首先我代表济南市委、市政府,向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济南位于泰山山脉以北,古济水(今黄河)以南,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泉城,也是黄河下游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考古发现的西河文化证明,早在距今 8500 年前,济南地区就已有人类生活繁衍。大家知道,龙山文化的发现与命名就是在章丘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这里不仅是最早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地,而且被考古学界看成中国近现代考古的“圣地”。去年济南东郊大辛庄发现了一片商代甲骨文,这是殷墟之外首次发现的商代甲骨卜辞,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两周之际,济南地区渐成为齐国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许多古代著名的战争都发生在济南地区,比如大家所熟悉的“齐晋鞌之战”就发生在济南市北部的华不注山一带。两汉时期济南地区的地位更为重要,先后为济南国、济南郡和济北国、济北郡所在地,当时济南郡国的工官、铁官都非常有名,而且众多的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次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办,本身就说明了济南在汉代考古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当然,这与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济南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和进行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是分不开的。长清双乳山济北王陵的发掘、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的发掘、章丘危山汉墓兵马俑陪葬坑的发掘,均先后被评为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为研究济南的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随着对这些出土文物所进行的深入研究,也将会对济南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此,请允许我代表济南市委、市政府和济南人民,向那些为济南文物考古工作做出贡献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是济南文化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更是章丘市的一件大好事,希望章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为大会服务好,为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做好各项工作。

近几年来,济南市在省委、省政府和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社会经济正在取得更大的成绩。现在,济南的趵突泉和章丘的百脉泉喷涌的都非常好,各位专家学者们可以利用会议休息期间,看看泉水,亲身体验一下“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泉城风貌。

最后,请各级领导、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关心、支持济南,欢迎大家常来做客。预祝本次学术研究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邢玉斗

尊敬的庄局长、刘所长、朱主席,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山东省文化厅,向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山东文物考古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代的赵明诚著有《金石录》,清代的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由中国学者自己组织的最早用近代考古学方法发掘遗址之一。几十年来,在中央文物考古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在省内外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山东的考古工作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单就汉代考古来讲,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临沂银雀山汉代竹简的发现,临淄大武汉墓陪葬坑的发现、临淄乙烯工地上千座汉墓的发掘、曲阜九龙山鲁王陵的清理、菏泽红土山汉墓的发掘、济宁任城王陵的发掘,以及近些年来长清双乳山济北王陵的发掘、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的发掘、日照海曲汉墓的发掘、章丘危山兵马俑坑的清理及陵园的全面勘探、章丘东平陵故城的调查勘探和城墙的解剖等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对汉代考古的全面综合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山东省还是汉代画像石的重要分布区域,画像石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此外,近几年来,山东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还发现许多汉代墓葬和相关遗迹,这些资料都为汉代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山东是文物大省,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汉初的齐国有70城,富甲天下,在汉代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后来,在山东境内被分封的诸侯国最多时近十个。社会文化的发达,留下了许多古文化遗迹,因此,对山东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讲,任重而道远。我衷心地期望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山东省的文物考古事业,共同为汉代考古和汉文化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次会议在章丘召开,章丘的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有关办会的同志付出了许多劳动,我代表省文化厅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期间,除了进行有关学术课题的研讨外,我希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能给山东省的文物考古工作多提些好的建议,今后多来山东看看。

最后,预祝与会代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关于当前汉代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刘庆柱

一 汉代考古学的定位问题

汉代考古学的定位,首先要对汉代历史有个基本认识。汉代是从王国发展为帝国的时代,是血缘政治越来越弱化、地缘政治越来越强化的时代,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帝国时代,是地缘政治带来国家地域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的迅速趋同时代。

汉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时期,汉代考古学对于研究、理解汉族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形成问题,那时的国家是我们今天国家的“祖型”,但是从区域角度来说,他们还有一定距离。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实际上是解决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形成与早期发展问题,因此其重要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了。

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地域范围,与我们近代、现代的国家疆域大体相近。现在学术界通常所说的“汉文化圈”,范围更大一些,主要包括东亚的中国、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南亚的越南等地。汉代考古学与汉文化内涵基本相近,但也有所不同,汉文化以汉字、儒家思想(尤其是礼制)、汉译佛经等为其核心内容。

当今的汉字基本上形成于汉代,这可以从古文字学的历史得到充分证明;汉代的汉字已在汉王朝的管辖区域之内通行,如当今的新疆、青海、内蒙古、东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均发现有汉代文字的汉代考古学文化遗物。

孔子的儒家学说产生于东周时代,但儒家思想的确立在西汉时代中期,即董仲殊提出并被汉武帝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一直为汉代及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乃至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古代社会奉为圭臬,它主要反映在国家封建社会的礼仪等级制度的建立、推行,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观念集大成的“天人合一”、“尊卑有序”的建筑或建筑群中体现的思想理念,“以农为本”生业观念,以地缘政治为主的国家架构和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基础长期并存的历史特色;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容“老庄思想”,实施“法家”的行政理念,这些成为实际上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古代历史社会的思想基础。东汉时代佛教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得到空前发展,并迅速传播到东亚、东北亚地区,唐代佛教达于其鼎盛时期,“儒”、“道”、“释”成为中古及其后中国乃至东亚汉文化圈的最为重要思想。

中外文化交流是汉代考古学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西汉中期张骞受命出使西域,拉开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幕,开辟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或称“沙漠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被学者作为文化交流、商业贸易之路已深入人心,但是我不得不指出,汉代的“丝绸之路”主要应该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当时“丝绸之路”上

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各种各样遗物、遗迹主要是从事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人员与当地人们来往的物质遗存,汉代“丝绸之路”,有多少中外商业贸易成分是需要认真研究、慎重对待的,不可简单化、概念化、夸大化,中外文化交流可视为汉代“丝绸之路”的“副产品”。读到“丝绸之路”,我以为从时间上讲最早的应为“草原丝绸之路”,其主要应为“东西文化交流之路”;其后为“沙漠丝绸之路”,也就是前面我所说的汉代“丝绸之路”,其主要应为“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再后则为“海上丝绸之路”。其主要应为“商贸之路”。

作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定位,其空间特点必须特别注意。汉代的三辅地区、伊洛地区和山东地区至关重要,三辅是西汉时代的国家政治中心,伊洛地区和齐鲁地区是当时国家的经济重地,伊洛地区还是东汉一代政治中心。

二 汉代考古学的回顾

汉代考古学应始于20世纪初年,这时的“考古”活动,多以“探险”名义出现,如1900~1901年A.斯坦因对新疆尼雅遗址的发掘、斯文赫定对古楼兰遗址的发掘,1906年斯坦因对敦煌附近汉代烽燧遗址的发掘,1906~1907年关野贞对陕西汉代帝陵的调查,1910~1912年日本滨田耕作等对辽东半岛汉墓的发掘,1913~1915年斯坦因对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1914年法国考古学家V.色伽兰对陕西汉代帝陵、四川崖墓和石阙的考古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参加了一些中外合作的考古调查、发掘项目,比较重要的有黄文弼先生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的汉唐城堡、屯戍遗迹调查,在罗布卓尔发掘的汉代烽燧遗址;1930~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对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是20世纪前半叶汉代考古学中的重大发现。1934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发掘了陕西宝鸡地区的西汉墓。1939年金毓黻先生等在重庆调查了崖墓、石阙,发掘汉代画像石棺墓。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发掘了四川彭山汉代崖墓,考察了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调查了陕西的汉代帝陵,对甘肃汉代阳关、玉门关遗址和长城、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这期间,在日本占领区,他们对山西阳高汉墓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总的来说,20世纪前半叶的汉代考古工作是不多的,而且其前段又大多是外国人以“探险队”名义进行的。

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6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一些地方考古单位开展了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福建崇安汉城遗址、河南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冶铁作坊遗址等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对河南洛阳烧沟、辉县琉璃阁、禹县白沙水库、密县打虎亭,湖南长沙,江苏徐州,山东梁山、沂南和安丘,陕西绥德和潼关,河北望都和定县,四川昭化和川西北地区,云南晋宁石寨山,辽宁西丰西岔沟,广州,甘肃武威,内蒙古札赉诺尔和陈巴尔虎旗,新疆昭苏县等地的汉代墓葬进行了清理和发掘。

“文化大革命”中,考古工作近于停顿,但是有些汉代考古发现却十分重要,如河北满城汉墓、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山东曲阜汉代鲁王墓、广西合浦牛岭西汉墓、山东临沂银雀山及其出土的汉简、甘肃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和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与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云南楚雄万家坝古代墓葬、洛阳卜千秋西汉壁画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木槨墓等。

“文化大革命”结束,科学的春天到来,考古学包括汉代考古学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最近20多年的汉代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学术积累,超过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进展。

在汉代考古学学科基础建设方面,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几乎涉及了汉代考古学的所有重要方面,如城址考古工作从都城遗址到一般城址无所不包,都城遗址考古从过去仅仅限于城址范围、城门方位、道路分布等基本认识,扩大至宫城、宫殿、官署、市场、手工业作坊遗址等考古工作。一般城址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至于墓葬考古,从帝王陵墓至各类墓葬,其考古发现也是过去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据不完全统计,已发掘的汉代诸侯墓约40多座,其它汉墓清理逾十几万座。汉代遗址、墓葬的大规模考古清理、发掘,出土了数目惊人的汉代遗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考古学中,汉代考古规模之大、出土遗物之丰富、对学术界和社会产生影响之深远是十分突出的。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有汉长安城遗址、南越国宫城遗址、福建崇安汉城遗址等,汉宣帝杜陵陵寝遗址、汉景帝阳陵陵寝遗址与陪葬坑、广州南越王墓、徐州楚王陵、永城梁王陵等,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湖北、内蒙古等地的一般汉代墓葬清理发掘数量众多。汉简的发现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其特殊的学术地位,当然这也是汉代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周边地区的汉代考古,近20多年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疆地区的汉代考古重大发现层出不穷,与汉代时代相当的云南滇文化和贵州夜郎文化、四川“西南夷”文化考古新发现已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考古学认识,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考古填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考古学空白。

三 当前汉代考古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如上所述,汉代考古学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为社会与学术界所认同的。但是,毋庸讳言,汉代考古学要进一步发展,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注意。

(一) 考古资料整理、考古发掘报告编写滞后问题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已有重大变化和进步,仅最近十几年来,已出版的汉代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近三十部,待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有十余部。但是,已经出版或待出版的汉代考古发掘报告,相对我们田野考古所取得的大量考古资料仅是其很少一部分。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是考古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认为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于考古学的重要性,犹如“二十四史”之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学学科存在、发展的基础。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学学科基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考古学学科创新与原始创新的基本体现。通过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使科研人员的一些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加深对学科的理解,使田野考古经验得到升华,经验上升为规律,从经验和规律探索出理论,这将使田野考古水平提高成为可能。当前我们必须改变只发掘不整理,或者急于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严重滞后的局面。否则,重要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就会“鲜”的放成“蔫”的,“蔫”的放成“烂”的。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只搞田野考古清理、发掘,而田野考古资料不进行整理或整理不出来,考古发掘报告编写不出来,无异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

(二) 相对史前考古学、先秦考古学而言,汉代考古学的基础与综合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中国考古学中,汉代考古学资料之丰富是很突出的,作为学科的基础与综合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目前与史前考古学、先秦考古学学科相比较,汉代考古学的基础研究、综合研究都存在着一定差距。究其原因有三点:其一,汉代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工

作繁重、田野考古资料众多,资料整理任务大、工作头绪多;其二,较史前考古学、先秦考古学,汉代的历史文献数量要极大地超过前代,汉代考古学要十分关注历史文献学,如果将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比作车子两轮的话,汉代考古学的学者需要在历史文献方面用去更多时间和精力;其三,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发展,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发展历史也是概莫如此。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人类20世纪发展所积累的人类知识、物质与精神财富,比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数千年的(甚或自人类出现以来的百万年)全部积累还要大得多。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我们处在一个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同样有汉一代的物质文化积累,可能较其以前千百年发展的总和还要多。作为以过去的人类或与人类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其研究对象自然也是遵循这一科学发展规律的,这就导致在相同起跑线上,历史考古学较史前考古学学科研究滞后的表象。认识到人类历史的这一特点,我们应以更大、更多的投入,使汉代考古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不要滞后,不要影响中国考古学学科的整体发展。

在汉代考古学学科发展中,我们应该要强调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如在汉代城址的田野考古基础之上,加强相近城址比较研究,加强不同等级城址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能仅仅限于城址形制结构的比较,更为重要的是对比较出来的物化现象的不同之深层原因的探讨及科学解释。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一研究,有些方面的基础性田野考古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开展,我们以往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进行的比较多,郡治所在的城址、县城遗址及其它城址开展考古工作甚少。有的虽然进行了一些田野考古工作,但是大多仅仅停留在城址范围、城门位置的确定、城内道路分布的了解、城址堆积所反映的城市功能分区的推测等等。在考古学研究中,重点与一般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现在应该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址(如汉代各地王国的都邑、郡治所在城址、县城遗址等),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在此基础上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宫殿区、官署区、手工业作坊区、百姓居住区、市场等分门别类进行考古发掘,以期得到较为全面认识。目前县城遗址所进行的考古工作,更显薄弱。至于一般村落遗址考古,更是寥寥无几。在所有的各类城址、聚落遗址考古工作中,均以百姓里居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展的最少。这一方面是当时城或村落中的百姓里居建筑简陋,不宜保存;另一方面,里居建筑遗存多被晚期建筑所破坏,故其遗址保存极其不佳。尽管百姓里居遗址考古困难重重,但是作为当时社会基础的城市里居遗址和广大村落遗址考古,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要探讨相应的方法,采取不同的手段,以期在城址里居和一般聚落民居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有所突破。

(三) 重视周边地区汉代考古学研究

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关键发展时代,是华夏文明发展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时期。由于秦王朝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使命就落到了汉王朝身上。从考古学上探索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研究汉代考古学的形成、发展过程。汉代考古学的发展表现为时空两个方面,时间上由早到晚,空间上由内地到周边。因此研究周边地区汉代考古学,成为揭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1. 新疆地区的汉代考古学问题

秦王朝的西界在今兰州与西宁之间,西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使其西界已到今塔什干附近。近年来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因为其所处东西方交汇的特殊地理区位,使人们看到这是一个考古学文化十分复杂的地区。但是毋庸置疑,在这里汉代考古学文化影响重